

引子

本书不仅记录了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合作，也体现了对全球发展的动因机制的思考。这些思考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紧密相关。

2007年，当我第一次来到非洲时，这片大陆让我想起了在上海的童年。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艰难时期。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不足八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厕所，要去楼下上公厕；没有厨房，家家户户在街边点起烟雾缭绕的煤炉。到了炎热的夏天，我父母通宵轮流扇扇子，赶蚊子，只为能让我睡着。下起雨来，总有大片的街道被淹，学生们要把裤管卷到大腿根，蹚水去上学。街上跑的是几十年前生产的老式轿车和破旧的“面的”。每天上下班时，数以百计的人群聚在车站周围，焦急地等着公交车，可往往一个小时都未必会等来一班，而车上则必定塞得每个人都动弹不得。孩子们的衣服至少一个星期才换一次，没有玩具，大家只能踢着石子或围着沙堆玩……

这一切和今天的拉各斯^①、内罗毕^②或达累斯萨拉姆^③何其相像！我经常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国的外国游客们是否会带着与我们现在看非洲时相似的眼光？贫苦的生活、落后的工业、脏乱的市容、官僚懒散的作风，与富庶的发达国家相比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星球，其间差距只怕短时间内难以赶上。正如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曾在21世纪初将非洲称为“毫无希望”的大陆，几十年前，也有无数人，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曾认为中国没有任何希望。

这种对非洲的现在与中国的过去的比较，贯穿了我近年来对中非关系的研究。中国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实现这一巨大的转变，而非洲经济却停滞了几十年？进而，中国的努力怎样能为非洲的增长作出贡献？这些是研究中非关系的学者常见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早在2012年，我还在

① 拉各斯，尼日利亚旧都和最大港市。

② 内罗毕，肯尼亚首都。

③ 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原首都。

华盛顿工作时，就开始用中文起草一本关于中国和非洲经济外交的书稿。不过，随着写作的推进，我认识到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这些问题。

首先，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文化议题，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价值观和人生目标的分歧。非洲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紧赶慢赶，执着于效率。流行的观点与一些研究者将此归因为文化差异。可是，我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时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化主义观点，但对中国人的评价恰恰相反。当时，中国人被描绘成没有上进心、易于自我满足、擅搞裙带关系、保守、狭隘、无所事事、专注于意识形态。与此相对，西方人被认为是务实、高效、纪律严明和勤奋工作。中国国内无数的媒体文章和社会辩论反思了这种社会文化差异，并呼吁采取更多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市场改革的初期，伴随着经济发展，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遗憾的是，不着形迹的文化价值的转变很容易被物质收益的展示所掩盖。此外，新价值观在胜利后通常将传统观点视为错误或不合理，完全否定它们的价值并将其遗忘埋葬。不过，由于我本人亲历了这一过程，所以能清晰地记得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时代精神的快速变化，在当下的中非交往中也能发现类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

其次，发展由普通人多姿多彩的实践和生活组成，而不仅仅是单一明确的政策制定。我见证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全程，记得那个变革时期的动荡与平凡。每一个决定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争议，伴随着来自中国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反对，来回反复的变化非常普遍。尽管面临许多分歧，但发展就是推动整个社会前行。尽管每一步都很小，但充满了汗水和思考。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努力和沟通，积累而成为国家层面的重大转型。经历了这段历史的细节，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故事并非奇迹，因为每一次活动和探索都是如此真实与具体。只有当人们忽略了生活中无数微小的变化时，他们才会对累积的成就感到惊讶，并称之为奇迹。日常活动与思考对于人们了解转型如何真正发生和运作至关重要，因此，我的研究精心挑选了案例，并描画了细节，以展现非洲转型和中非交往中的具体挑战和努力。

最后，现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关键问题是可持续性，即持续的生产

力增长、财政健康以及社会和环境平衡。可持续增长的效果必须在较长的时段，至少以几十年为尺度加以检验。因此，本书不谋求为这个问题提供结论性答案，而专注于阐明中国和非洲的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可持续发展议题，以及他们如何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一段仍在进行的历史中，了解不同的人在考虑和做什么比急于对他们作出判断更有意义。研究人员、读者和实践者都是世界当下历史的一部分，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全球性挑战。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代表一种新的观点，而且能成为世界各区域相互理解的桥梁，以使他们的努力能够朝着共同的目标汇聚。

在此，我要感谢过去十年来接受我采访的中国和非洲数千名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我的访谈对他们来说是额外的工作，但他们经常在忙碌日程中自愿提供帮助。有时，受访者一边处理日常业务，一边抽空回答我的问题。这样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对话对我却有极大的启发，我能够从中了解他们的经验，并从他们多年乃至一生的实践中获得智慧。这些访谈让我大开眼界，对我的研究至关重要。可以说，这些实践者是我研究中非关系的真正老师。

此外，我要感谢黛博拉（Deborah Bräutigam）教授，她对中非关系的严谨研究和基于事实的发现为这一领域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她一起做研究完全重塑了我的学术生涯，并进而重塑了我的生活。她的见解和方法帮助我从哲学博士转变为发展研究的学者。我也衷心感谢她愿意为本书撰写序言。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与其他同事的讨论也极有价值。我特别感谢本书草案和初稿的匿名审稿人。他们的建议和评论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完善了论证并改进了结构。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 Chris Harrison 博士和 Joe Ng 博士支持和鼓励我完成本书。

本书有部分章节摘自我 2014 年在北京出版的《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一书。美婷（Cheryl Mei-ting Schmitz）将这些章节从中文译成英文。孙媛、嘉妮（Janet Eom）、杨迪生、Victor Perez Garcia、

邓书戈 (Saeger Godson)、安天浩 (Gloria Enrico)、胡曦文、贾泽彤、熊星翰、唐溪源、肖齐家和余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都曾协助我的相关研究工作，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相关实地考察旅行的经费由德国 Boell 基金会、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 的低收入国家私营企业发展 (PEDL) 项目、英国 DFID-ESRC 增长研究计划 (DEGRP)、中非联合研究计划和中国教育部提供。

第 1 章 没有模式的“模式”

1.1 中非合作背后的驱动力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令全球瞩目。2006 年 11 月，48 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包括 1 500 多名商务人员和 41 位国家首脑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是中国首次展现在这片黑色大陆上惊人的政治影响力。

2009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尽管在 2014 年达到 2 100 亿美元的峰值之后，中非贸易额在此后几年中有所下滑，但中国仍然牢牢占据对非贸易第一的位置。例如，2018 年中非贸易额为 2 041.9 亿美元，超过非洲与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贸易的总和。^① 中非贸易的强劲势头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2000—2014 年，中非贸易增长了 20 倍。同期，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也从 2003 年微不足道的 4.912 亿美元飙升到 2017 年约 433 亿美元。^② 而且这个数字还只是保守的估计，通过离岸金融中心中转的对外投资并没有计入，中资公司海外部门收购的非洲资产也未被统计。^③

中国政府的支持推动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在 2015 年中非约翰内斯堡峰会和 2018 年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在 2016—2021 年提供总计 1 200 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非洲发展。工程新闻记录(ENR)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承包商在非洲整个建筑市场中占有高达 59.8% 的份额。^④ 从基础建设到贸易和投资，中国在非洲众多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非关系的迅猛增长使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影响力黯然失色。为了应对

① 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 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2017, <https://comtrade.un.org/db/> (访问日期: 2019-10-28)。

② 国家统计局, 年度数据, 2017, <http://data.stats.gov.cn/> (访问日期: 2019-10-28)。

③ Mayer Brown, “Playing the Long Game: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4, p. 5. 例如,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 2009 年收购了瑞士 Addax 石油公司, 并获得了其在非洲的资产。

④ Gary J. Tulacz and Peter Reina, “The Top 250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Engineering-News Record*, 2018, 20(27), p. 42.

不断加强的中非合作，美国国会于 2011 年和 2012 年举行了两次听证会，以评估非洲局势变化。参议员们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外交影响表示极为忧虑。在 2013 年的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约翰·克里（John Kerry）明确表达了美国担忧的根源：“中国的势力已遍布非洲——我是认真的，遍布非洲。他们正在推进购买矿产的长期合同，和（其他活动）……”媒体也大肆渲染美国政府对中非关系的紧张情绪。2013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非洲时，CNN 的评论开场白就说：“奥巴马总统的非洲之行只有一个潜台词：中国。”^① 同样，2014 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期一周的非洲巡访中，一位日方高级官员也提及：“无论安倍首相走到哪里，都会被问到他是否来这里与中国竞争。”^② 特朗普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发布的非洲战略根本没有提到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或南非等主要非洲国家，却 17 次提到中国，视中国为美国在非洲的头号竞争对手。

许多非洲领导人对与中国的合作大加赞赏。例如，卢旺达时任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指出了中方的独特优势。他认为，欧美的援助都不能带来持续性发展，而中国的援助则集中于贸易和投资促进，“为非洲的财富创造带来了更大的机会”。^③ 塞内加尔前总统阿卜杜拉耶·韦德（Abdoulaye Wade）如此描述中非合作：

我告诉我的西方朋友们，中国在满足非洲市场需求方面比西方资本家做的好得多。中国针对我们需求的方式比欧洲投资者、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迟缓傲慢的后殖民主义方式更符合实际。事实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能给非洲很多启迪……中国人正以更快的

① <http://edition.cnn.com/2013/06/26/opinion/bergen-obama-china-trip/>.

②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5668503>.

③ Paul Kagame, “Why Africa Welcomes the Chinese”, November 2, 2009,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9/nov/02/aid-trade-rwanda-china-west (accessed July 10, 2020).